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苏南发展研究丛书

陈忠/主编 林萍/副主编

城市发展： 劳动流动与产业升级

朱妍/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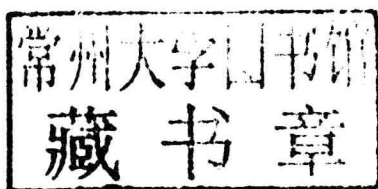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苏南发展研究丛书

陈 忠/主编 林 萍/副主编

城市发展： 劳动流动与产业升级

朱 妍/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发展:劳动流动与产业升级/朱妍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 12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苏南发展研究丛书/陈忠主编)
ISBN 978-7-207-08904-5

I. ①城... II. ①朱... III. ①劳动力流动—关系
—产业结构—研究—中国 IV. ①F249.21 ②F1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1472号

责任编辑:李 珊 李智新

封面设计:语墨弘源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苏南发展研究丛书

城市发展:劳动流动与产业升级

朱 妍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圣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904-5
定 价 30.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什么是好的城市,如何建设好的城市?

——关于中国城市发展与城市研究的基础视阈

(代总序)

陈 忠

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近50%并将继续提升。人们在不断感受城市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日益遭遇诸多始料未及的城市问题。什么是好的城市,如何建设一个好的城市,成为人们聚焦和关注的重要问题。正如著名城市学家芒福德、科特金等学者所指出,城市是人类的最伟大作品,“人类最伟大的作品始终是她所缔造的城市”^①,没有对城市本性的深层把握,没有合理的城市观,城市的发展前景将令人堪忧。树立合理的城市观与城市研究视阈,对规范城市发展行为,建构更加合理的城市与城市社会,具有基础意义。

一、复杂“城市性”与城市研究的综合视阈

关于城市本性(城市性),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认识。在建筑学视野中,城市是不同建筑的集合体,一个好的城市首先是空间结构合理、布局与功能完善的城市;在经济学视野中,城市更多地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一个好的城市也就是产业结构合理、有产业比较优势与经济竞争力的城市;在政治学视野中,城市更多地是一个独特的权力与治理结构,一个好的城市也就是一个有良好权力关系与治理秩序的城市;在社会学视野中,城市是一种不同于乡村社会的新型社会

^①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 城市发展:劳动流动与产业升级

关系,一个好的城市也就是一个社会矛盾较少、社会关系和谐的城市;在文化学视野中,“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Polarization)。”^①在文明史与历史学视野中,城市是诸多人类文明要素的聚集,一个好的城市是一个可以保存与发展人类文明的场域。

在分门别类研究城市的同时,面对日益巨大的城市、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诸多学者开始注重用一种多维、综合的眼光看待城市,努力呈现城市本性的复杂性、杂糅性。在《全球城市史》的作者科特金看来,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体,意义、繁荣、安全是一个可持续城市的三个必备要素,“有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这些城市的全面健康发展,即: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在这些因素共存的地方,城市文化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最后被历史所抛弃。”^②在列斐伏尔、索亚等看来,城市社会是深刻区别于乡村社会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社会发展阶段或社会建构方式。城市发展不仅是人口、资源、技术、产业等文明要素的空间化聚集,更是发展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文明传承方式等的整体性转换。列斐伏尔认为,城市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空间改造与经济增长过程,城市化是人们在历史与社会条件下进行空间生产的过程,作为经济过程、资本运作过程的空间生产、城市发展,实质上具有深刻的政治性、文化性。在《韵律分析》(Rhythmanalysis)一书中,列斐伏尔倡导从社会、历史、空间相统一的角度认识空间生产与城市发展、社会变迁。在他看来,城市发展、空间生产“任何情况下,都是场域(place)、时间(time)与精神(energy)的互相作用的过程,这就是韵律”^③。在索亚看来,城市是人与空间相互作用的产物,“一方面,我们的行动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围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生活其中的作为聚集性和社会性产品的空间与场域也以一种我们刚刚开始认识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行动和思想”^④。需要从空间性、社会性、历史性三个维度的统一中,从第一空间(作为实物的空间、空间中的物体)、第二空间(作为表达的空间、关于空间的思想)、

①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②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③ Henri Lefebvre, *Rhythmanalysis*, London, Continuum, 2004, An Introduction.

④ Edward W. Soja, *Postmetropoli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2000, p6.

第三空间(作为行动和意义的实现和表达的对象与载体的空间)的统一,从空间的感知性(perceived)、构想性(conceived)和鲜活性(lived)的统一,去理解和认识城市。^①

在黑格尔看来,密纳发的猫头鹰到傍晚才起飞,认识论上,人们对仍处于过程中的事物往往很难把握其本质。城市研究也是如此。芒福德认为,“人类用了5 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②面对仍处于过程中并日益复杂的城市化,一方面,需要从不同专业视阈出发,对城市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推进城市经济学、城市政治学、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学、城市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更要求人们自觉确认一种综合的城市研究视阈,建构一种没有学科边界与专业归属的广义城市学、城市哲学,以对城市本性、城市问题、城市理想进行更为全面、综合、系统的把握。

二、内在“城市善”与城市发展的伦理视阈

生活城镇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是当代中国的三个重大发展任务、发展问题。能否正确理解、科学推进、统筹协调生活城镇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将深刻决定中国未来面貌。在快速发展中,城市化对中国的综合影响日益增大。一方面,城市化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另一方面,同城市化方向设置与推进方式不合理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有增多的趋势。进一步明确城市发展方向、转换城市发展模式、推进城市综合转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相对我国城市发展中实际存在的GDP情结、经济中心主义倾向,需要为城市发展注入自觉的发展伦理精神,实现城市发展的伦理视阈。

在古莱、可思波等看来,“发展伦理学的重要任务是使得发展行动保持人道,以保证在发展旗号的发动的痛苦变革不产生反发展,反发展摧毁文化,付出过度的个人痛苦并牺牲社会福利,这一切都是为了利润,为了绝对化的意识形态,或是为了某种所谓的效率需要。”^③面对经济中心主义发展实践所引发的诸

① Edward W. Soja, *Postmetropoli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2000, p12.

②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③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4 城市发展:劳动流动与产业升级

多问题,需要确立一种符合伦理精神、以人为目的的新发展观、发展伦理观。发展伦理学对发展进行两个层面的反思,其一,什么是发展的目的,什么是好的发展?其二,什么是合理的发展手段,如何实现好的发展?关于发展的目的,古莱等认为,在发展与人 的关系中,发展是手段,人是目的,发展的根本目的不是经济效率,而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由三个要素构成。“有三种价值观是所有个人和社会都在追求的目标: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与自由。这些目标是普遍性的,虽然特定方式因时因地而异。”^①关于发展的方式,古莱等认为,不论是采取何种技术、经济、政治手段,“发展的好处应当惠及所有的社会,惠及社会上的每一个人。”^②在推动发展时,“所有的社会都可以找到物质刺激与精神刺激的某种混合,因为两者都是必需的。”^③普遍参与普遍团结对推进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受益者的参与或者发挥某种积极作用是一切形式的发展所不可少的特征。”^④符合伦理精神、具有伦理底蕴的发展,也就是一种发展的手段与目的两个方面都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发展,一种具有自觉的“内在善”的发展。

对我国城市发展而言,明确城市的发展伦理底蕴,自觉建构“城市善”,对规范中国城市发展、解决中国城市问题、推进城市综合转型,尤为迫切与重要。“城市善”是“什么是好的城市”与“如何建设一个好的城市”的深层伦理统一,是对城市发展目的、城市发展手段的“人本性”的自觉确认。推进“城市善”的过程,也就是用“以人为本”统筹城市发展目标与城市发展手段的过程。其一,推进城市善,需要进一步明确城市发展的目的。城市是一个财富有机体,更是一个生活有机体。“人们聚集到城市里来是为了居住。他们之所以聚居在城市里,是为了美好的生活。”^⑤在人与城的关系中,人是目的,城市是载体与手段。是否有利于人的成长与全面发展,是评价城市发展目标是否合理的根本标准。其二,推进“城市善”,需要进一步规范城市发展手段。面对不合理的城市化手段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规范城市发展手段势在必行。能否处理好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城市空间扩张、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改善、生活幸福的关系,是评价城市发展手段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其三,城市发展决策过

①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②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③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④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⑤ 芒福德:《城市文化》,宋峻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517页。

程的科学化、民主化,社会多元主体的普遍团结及其对城市发展的普遍参与,是实现城市发展目标与城市发展手段相统一,构建“城市善”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政府主导型城市发展的现实语境下,逐渐淡化各级政府发展与政绩考核中的GDP色彩,对建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生活幸福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繁荣的城市,对建构“城市善”,具有基础意义。

三、本土“城市根”与城市发展的中国视阈

城市化、城市社会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一方面,城市化、城市社会是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趋势,“只有在城市这个古老的神圣、安全和繁忙的合流之地,才能够塑造人类的未来。”^①另一方面,人们对城市意义、安全、繁荣的理解和建构,不同国家地区的城市化道路又具有深刻的本土特殊性、文化多样性。面对突出的城市趋同化、无差异化、无个性化,尤其需要确认城市发展的本土“城市根”,为建构既符合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又切合本国实际、直面本国问题、各具特色的中国城市形态与中国城市社会,提供基础视阈、文化自信。

明确中国城市发展的基础视阈,确认中国发展的本土“城市根”,需要处理好三组关系。(1)城市目的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一般而言,城市以人为目的,城市是一个综合文化体,确认城市发展的人本性、文化性,对规范中国城市发展行为、明确中国城市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人与文化又都是具体的,不同地区与国家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等具有差异性,不同地区与国家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走向也存在差异性。城市形态是人的主体需要与文化精神的对象化、现实化,没有人性与文化的具体性,也就没有城市形态与城市社会的个性化。充分考虑和尊重城市发展文化基础与文化走向的具体性,是建构既符合城市化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城市体系、城市社会的重要观念前提。(2)城市发展构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正确处理政府、社会、市场等的关系,是实现城市良性发展的一般构架。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有其特殊性。“中国城市是在以农为本的文明框架内兴起的。”^②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及当代复杂竞争环境,共同造就了政府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在自觉培育城市社会发展的多元主体力量的同时,客观历史地评价“政府主导型城

①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

②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市化”对当代中国、当下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意义。(3)城市形态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经济全球化语境下,不同地区的城市功能有趋同的趋势。这与人的基本需要的同构性及产品、技术、业态等的全球同质性内在相关。但城市功能的这种趋同化,并不意味着城市个性的必然消失。在芬伯格看来,即使是现代性技术,也具有深刻的多样性、可再造性、可选择性。^①如何结合不同地区的地理气候、文化传统,挖掘、创新有一定差异性的本土化城市元素,构建有本土特色的城市形态,对提高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建构中国城市社会的文化独特性,实现中国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基础意义。

确认城市发展的本土“城市根”,是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具体统一。一方面,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形态、城市社会,需要挖掘、传承中国传统的城市文化元素,没有对中国传统生存方式、居住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的传承,也就没有城市社会语境下的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塑造中国城市个性,更需要不断进行自觉的城市文化创新。从起源始,城市就是人类创新的产物,“城市也代表着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的恩赐,而是另起炉灶,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可操控的秩序。”^②“城市表达和释放着人类的创造性欲望。”^③推进城市发展的民主化进程,充分发挥不同文化主体在城市形态构建与城市文化建设中的首创性、创造性,将深刻推进中国城市形态与城市社会的特色化、本土化。文化保存意识与文化创新意识的双向自觉,将使中国城市发展、城市形态、城市文化既符合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个性。

四、苏南“城市型”与城市研究的人类学视阈

人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城市的兴起晚于农业革命,城市化是一个近代的发展现象,社会演进的常规次序是“狩猎与采集——农业——村庄——城市——国家”。索亚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挑战,认为还存在另一种次序,一条“首先是城市”(putting cities first)的次序。通过反思坐落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谷的杰里柯(Jericho)等城市的发展,索亚指出,“新石器和农业革命以及随后的书写的发展、纪念性的建筑、国家和其他文明的先决条件都可以视为从城市的起源

① 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②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1页。

③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中发展而来的,而非相反。这个观点推翻了很多史前史的传统解释。”^①在索亚看来,城市的起源早于农业革命,城市化不仅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而且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起源性动力。需要把“城市的起源在时间置于农业革命之前”,“有必要把村镇的联合……看做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基本和持续的动力”。^② 科斯托夫在《城市的形成》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早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③,“早期的城市以多样化的面孔出现。在进入主体讨论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放弃这样一个观点——即城市是从村庄形式开始有机地生长起来。”^④索亚、科斯托夫的观点当然可以商榷,但他们对社会发展次序、城市生成与作用的这种颠覆性反思,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城乡关系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需要对城乡关系进行更加细致与辩证的考察与理解,离开了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深刻理解,对城市本质、城市化的理解可能出现偏差。

需要在城市发展与城市研究中引入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视阈。在哈维兰等文化人类学家看来,当代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文化相对论,承认、尊重多样文明存在的合理性;一个基本功能是反思、批判片面的自我中心论,倡导从多样统一的角度考察文明与文化的关系。^⑤ 对当代中国城市研究而言,引入以多样并存为基本观点的文化人类学视阈对于重新理解、合理定位中国城市化的未来方向,重新理解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探索中国城市社会的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城市与乡村的多重分裂。这种分裂不仅表现在城市与乡村在空间上的分裂,在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更表现在土地管理、社会管理等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上的巨大差异。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当代的城市化,在诸多方面仍然深层延续着传统的城乡二元模式,中国当代的城市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直接或间接的“盘剥”基础上。形成这种城市与乡村深层多重分裂、城市压制乡村的社会建制、社会运行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观。自觉引入人类学视阈、文化人类学态

① 索亚:《后大都市》,李钧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② 索亚:《后大都市》,李钧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③ 斯皮罗·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单皓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④ 斯皮罗·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单皓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⑤ 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度,有利于克服这种以城市为中心、不尊重甚至歧视乡村的城市社会观、社会发展观。

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从具体条件出发,探索推动城市与乡村共同发展、平等发展、平衡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一般而言,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基本上存在两种模式,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由上而下的城市化,一是以乡村为主导的由下而上的城市化。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往往会出现第一种模式,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往往会出现第二种模式。众所周知,以苏州、无锡、常州等为中心的苏南地区是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区,既是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取得诸多成就的地区,也是率先遭遇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包括城市化的诸多深层次问题与矛盾的地区。作为资本主义较早萌芽的地区,作为人口、土地、资源的矛盾相对紧张的地区,作为乡村经济较早发育、较为发达的地区,苏南表现出强烈的自发城市化、由下而上城镇化的强大动力与深层需要。当这种内在需要与政府的强力推动相结合时,便产生了以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本土经济与外来经济、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共同发展为重要支撑的颇具特色的当代中国城市化、城镇化苏南模式。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苏南发展,所谓的苏南模式,不仅是一种有特色、重集体的经济增长模式,更是中国城市化模式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中国城市化的苏南模式、“苏南类型”有其巨大的成就,也有其需要进一步改革、转型升级的深层问题。反思苏南的城镇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对形成、运用中国城市研究的伦理视阈、文化人类学视阈,建构既反映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符合中国城市发展特殊国情的中国城市理论,探索由不同具体模式构成的中国城市化、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模式体系”,理解与解决城市与乡村关系的中国特殊性,具体、和谐、合理地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前 言

在当今经济的发展中,城市和城市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影响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心城市和城市体系的发展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关键。世界各国都在城市化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在应对城市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我国已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我国应采取何种城市化模式成为我国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吸收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因果和阿瑟的路径依赖思想,利用了迪克斯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建立了一系列模型,将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外部经济等因素纳入到了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使我们能够真正地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研究空间现象。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可以从内生的角度探讨城市的出现、发展、分异和城市体系演变的内在作用关系以及产业转移的动态过程。

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流动要素是劳动者,劳动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劳动者向高收入和低成本地区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聚集力和分散力同时起作用,聚集力的根源来源于城市内部的大市场对企业的吸引力和靠近城市市场使劳动者节约生活成本,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用形成了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促使劳动者向城市聚集。分散力一方面来源于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而导致的市场拥挤效应,另一方面来源于农业生产对土地的依附和农产品的运输成本。

2 城市发展:劳动流动与产业升级

本研究在回顾产业聚集和城市发展的传统理论并梳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脉络的基础上,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沿用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建立的市场潜能函数,解释城市出现和持续的内在机制,探讨单一城市的稳定性、新城市出现的条件与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讨论了劳动力有限流动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进而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解释了城市间产业差异形成的直接动因和内在机制以及城市间产业差异的逆转,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依据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

新城市的出现或原有城市规模的扩大,都受人口规模的变化以及企业和劳动力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如果人口规模小,则新城市的形成比较困难;如果人口规模大,则原有城市体系容易被破坏,容易形成新的城市。当在近距离范围内存在两个大城市时,如果两个城市之间没有形成生产的高度分工,那么这两个城市之间争夺资源的竞争将是很激烈的。

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城市规模的大小。当经济发展水平低且人口规模较小时,如果出现新城市,那么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和产业活动的密度都小。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城市范围和人口规模不断增大,而且呈现加速扩大趋势,原有城市的优势得到不断强化,稳定性增强。随着城市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城市化在一段时期内表现为原有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密度的提高。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大城市主导型模式将成为主要的城市化模式。

经济发展水平、工农业产品的运输成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性是影响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城市化率不断增大,城市化速度先增加后降低,城市人口由高密度居住向低密度居住转变。随着工业品运输成本的提高,聚集力不断增强,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城市人口居住密度提高,随着农产品运输成本的提高,城市化过程中的分散力增强,城市的范围、城市总人口和城市化率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无论考虑哪种因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障碍都是限制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障碍越大,城市化的进程越缓慢。

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资本积累、技术外溢是造成城市之间产业份额差异的直接原因。即使劳动力在城市间不流动,企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也会导致产

业的集聚和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通过控制贸易自由化和知识溢出效应可以调整在城市之间的一体化进程中产业聚集的规模。两个城市相对工资的差异和税收竞争可以促进产业在城市之间的扩散,不过这种扩散是有条件的。

经过实证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中上海的首位度较高,但是其他高位次城市规模不很突出,中间位序的城镇较多,中小城市比重大。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可知,新经济地理学广泛关注的变量工业品支出份额、工业品贸易成本和农产品贸易成本对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有很强的解释能力,进而通过工业品支出份额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可以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化水平产生的影响。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写作背景与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6)
第三节 研究内容	(8)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9)
第二章 聚集和城市发展的传统理论	(10)
第一节 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聚集理论的发展	(10)
第二节 城市理论的发展	(20)
第三节 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发展理论	(27)
第四节 城市化水平与城市规模的讨论	(32)
第五节 关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文献	(35)
第三章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及在城市研究中的应用	(39)
第一节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	(40)
第二节 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内容及发展	(53)
第三节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特点和贡献	(63)
第四节 新经济地理学在城市研究中的应用	(69)

2 城市发展:劳动流动与产业升级

第四章 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发展	(75)
第一节 城市发展的局部均衡及其影响因素	(75)
第二节 新城市的出现与城市规模	(85)
第三节 劳动力流动限制与城市发展	(95)
第五章 产业转移与城市发展	(105)
第一节 城市间产业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	(105)
第二节 城市间产业的聚集机制	(114)
第三节 城市间产业差异的逆转	(126)
第六章 城市发展的实证研究	(132)
第一节 中国的城市发展实践	(132)
第二节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	(141)
第三节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影响因素	(150)
第七章 结论	(157)
第一节 主要结论	(157)
第二节 启示与政策含义	(159)
第三节 本文的不足与研究方向	(161)
附录:实证部分所使用的数据	(163)
参考文献	(168)
后记	(182)

第一章 导 论

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必经阶段。在城市化加速阶段,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均超过了0.3%,美国达到0.52%。而中国自进入1990年代以来,城市化水平以年均1.2%的速度增长^①,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的速度,这标志着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一个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各级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建设规模不断壮大,城市的集聚扩散能力大大增强,城市形态也产生了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变。

第一节 写作背景与选题意义

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了大规模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和企业对劳动力的密集需求,由于相对于人均需求的企业的规模经济存在差别,规模经济越大的企业需要更大的市场区来支撑企业的正常利润,为了节约运输成本,靠近目标消费者,企业在市场区的中心选择区位。企业的区位确定以后,企业的员工为了节约通勤成本,在企业周围居住下来,导致企业周围的地租上升,居住密度提高,城市也就出现了。从18世纪开始到20世纪中叶,在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一些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了城市化。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集中”为主要

^① 房国坤,王咏,姚士谋等.快速城市化时期的城市形态演变及其机制——以芜湖市为例.经济地理,2009(8).